

129，而是個對母土有深刻認同的社會主義國際主義者。¹³⁰〈送報伙〉中的臺灣人與日本勞工朋友不分種族地團結抗爭，〈頑童伐鬼記〉（〈鬼征伐〉）¹³¹裡的太郎指揮包含朝鮮人、中國人、日本人及臺灣人在內的四十五位小朋友，同心協力除去資本家花園中的惡犬，奪回失去的樂園，都清楚顯示楊逵建設一個以社會主義為基礎的國際制度，追求各民族平等、無階級壓迫的世界之理想。因為立足於臺灣人民的階級立場，楊逵在政治上尋求臺灣自治的自由民主，文學上則堅持自主性的臺灣文學，這才是他最真實的圖像。五十多年前「橋」論爭期間楊逵在統治當局的恫嚇下堅守臺灣文學陣營，戒嚴時期猶念念不忘要盡力促成臺灣文學史的編寫，¹³²這些事實說明了文學雖然無法完全避免政治的干擾，但對臺灣文學自主性的認識與主張其實是超越在統獨意識形態之外的。

以五四運動為發端的中國新文學，在對抗列強的侵略中漸趨成熟；臺灣新文學則以反抗殖民體制為目的而開展，然後承載了臺灣人的歷史經驗向前奔流。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這四年間是兩岸文學匯流的契機，如果彼此未於一九四九年被再度隔離，臺灣文學與中國文學或許可能漸漸融合為一。然則在歷史已無法驗證之下，這種推測性的想法也只能是個假設，臺灣文學與中國文學間的距離如今確乎是越來越遠了！

¹²⁹ 基本上，筆者認為楊逵所處時空環境與今日之臺灣有異，尤其臺灣民族主義是為對抗伴隨國民黨統治而來的霸權文化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武力侵犯，而在近年間趨於成熟，因此不能用現今統派的中華民族主義或獨派的臺灣民族主義去衡量楊逵的思想，也不應草率地將他劃歸進中華民族主義者或臺灣民族主義者任何一類當中。但從楊逵針對日本殖民統治與國民政府的壓迫抵抗行動之中，其實可以見到他有一種素樸的臺灣人意識與認同臺灣這塊土地的精神。楊逵七十一歲時曾經回顧說：「在過去的那一段很長的時間裡，我受到很大的挫折、生活的困難，使我幾乎沒有寫作。我很遺憾，很慚愧我沒有努力，沒有寫作。這一點也反映在我們對臺灣史、臺灣文化的認識上了，我們對我們的苦難歷史只是零星的接觸，而很少可觀的研究成果。所以我們找不到東西可以認同，我們的文化意識是多麼混亂，因此文化上也找不到偉大的成就。」楊逵在中國文化霸權下對臺灣認同危機的深刻感觸，恰巧顯示出他本人對於臺灣文化極大的認同感。引文見〈我要再出發—楊逵訪問記〉，原載於《夏潮》第一卷第七期，1976年10月；收於《楊逵全集》「資料卷」，頁161。

¹³⁰ 與楊逵熟識的臺籍作家巫永福即曾指出：「楊逵是國際共產主義者」。見巫永福《我的風霜歲月—巫永福回憶錄》，臺北：望春風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9月初版一刷，頁74。

¹³¹ 發表於《臺灣新文學》第一卷第九號，1936年11月。

¹³² 一九七六年接受《中華雜誌》邀請，演講「日據時期的臺灣文學」時，楊逵當場提出「以轉載及選錄的方式評介日據時期臺灣作家的作品及作者」，以及「編寫一部臺灣文學史」兩項建議。見〈一個日據時期文學工作者的感想〉，原載於《中華雜誌》第一五七期，1976年8月；《楊逵全集》「資料卷」，頁3。

「中國改造論」論戰與二〇年代台灣左翼思想的傳播

陳芳明

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

問題的提出：從「中國改造論」到「台灣改造論」

台灣文化協會在一九二七年的左右傾分裂，究竟是受到外來力量的影響，還是受到社會內部的自主要求，是討論殖民地歷史的一個重要課題。依照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的說法，文化協會在分裂之前，內部成員對共產主義理論的掌握還不甚明確。不過，由於中國左翼運動的高漲，例如李立三與王明激進路線的抬頭；以及日本山川主義與福本主義的對峙，再加上折衷路線的日共系統之策略等影響，而終於反映到台灣左右派的分裂。這種政治路線的分裂，具體影響了台灣文化協會的內訌。¹

如果台灣總督府的分析是正確的，則事實證據的基礎在那裡，就值得深入去追究。中共極左路線，是由李立三與王明相繼構築而成。假使中共激進策略對台灣政治運動產生影響是事實的話，也必須透過台共組織的管道才能完成。問題在於台灣共產黨要到一九二八年才宣告組黨成功，而台灣文化協會的分裂卻是在一九二七年就已發生。其間的連繫，也許需要大量事實來支撐，才能夠合理化。也就是說，一九二七年的國共分裂是否牽涉到台灣文化協會的左右分裂，還有待進一步了解。

¹ 台灣總督府編，《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社會運動史》（複刻本，以下簡稱《警察沿革誌》），東京：台灣史料保存會，1969，頁244。

至於日本左翼陣營中山川主義與福本主義的對峙，是否也直接、間接對台灣左翼運動產生衝擊，也是亟待釐清的一個議題。台灣總督府在上述的警察檔案也指出，在一九二七年至二八年之間，台灣文化協會內部在策略與路線方面發生嚴重分歧。一是上海大學派（簡稱上大派），遵循中共的激進路線，一是由連溫卿的山川均主義所領導的非上大派，比較接近日本共產黨的綱領。²上大派的成員包括蔡孝乾、翁澤生、王萬得、潘欽信等人，偏向當時中共的戰略主張。非上大派的成員則有連溫卿、林朝宗、黃白成枝等，傾向於接受日共路線。台灣總督府的這個說法，似較貼近史實，不過，這種對立並不影響一九二七年的文協分裂，而是造成一九二九年新文協的再分裂。³

因此，一九二七年文協的分裂，是否就是國共分裂與日共分裂的延續效應，並不能成為歷史定論。殖民地台灣的政治運動，有其自主的歷史性格。沒有台灣特殊的政經條件，就沒有文協的左右分裂。中共的或日共的因素，在某種程度上可能對台灣左翼運動有一些催化作用，但不宜過分誇大。如果把焦點集中在文協分裂前的「中國改造論」論戰內容，或許可以找到一些歷史的答案。

所謂「中國改造論」論戰，是一九二〇年代台灣政治運動左右兩派在理論上爭論的一次對決。具體而言，這也是社會革命主張與社會改良主張的路線之爭。這兩條路線，是二〇年代初期啟蒙以降思想漸臻成熟的徵兆，也是暗示日後台灣知識分子如何實踐各自的政治信仰。重新評價這次論戰的意義，既可觀察當時的政治理論究竟到達怎樣的高度，也可測量出殖民地政治運動的主體性究竟何在。如果再對照論戰之後繼之而起的「台灣社會改造論」的檢討，台灣的主體性就更清晰明白了。

論戰前左右兩條路線的形成

參與「中國改造論」論戰的主要成員其實只有兩位，亦即代表右翼思考的陳逢源，與代表左翼立場的許乃昌。在兩人展開論戰的過程中，上大派的蔡孝乾也撰寫一篇文字插隊介入。從一九二六年八月到一九二七年二月，陳逢源與

² 同上。

³ 有關上大派與非上大派的內訌而終於導致新文協的第二次分裂的史實討論，參閱陳芳明，〈連溫卿與抗日左翼的分裂〉，《殖民地摩登》，台北：麥田，2004年，頁265-292。

許乃昌各寫兩篇長論。雙方爭辯的焦點，在於確認台灣社會的資本主義是否已臻成熟。資本主義的成熟與否，牽涉到日後殖民地政治運動到底是選擇民族路線還是階級路線。因為，路線的抉擇直接關係到政治運動的策略。若是走民族路線，運動策略將遵循合法的議會改革主張。若是採取階級路線，則策略有可能傾向於訴諸群眾的革命主張。因此，陳許兩人的辯論並非止於資本主義發展的議題，還進一步暗示了改良主義與革命主義之間的抗衡。這場論戰的格局雖然極其有限，但是兩人之間的言論往來，已經預告政治運動者內部的分歧路線之對峙。

論戰的爆發，自然有它一定的歷史發展過程。台灣文化協會在一九二一年成立時，最初是以聯合陣線的形式出現，亦即由左右翼知識分子的共同參與而組成。然而，不可否認的，右翼知識份子著手最早的組織行動，功不可沒。在歷史書寫上為右派資產階級辯護最力的葉榮鐘就特別指出，台灣近代史的濫觴，乃是由於林獻堂與梁啟超的見面而得到啟示。梁啟超是晚清立憲運動的主導者之一，依照葉榮鐘的說法，其議會路線的思想啟發了日後林獻堂對改良主義的抉擇。⁴質言之，台灣政治運動原先是由思想啟蒙的工作出發，而負起啟蒙任務者則是以右翼議會路線的成員為主導者。在殖民地運動初期，右翼改良主義誠然有其歷史階段的使命。他們一方面以思想啟蒙為重心，積極喚醒台灣人的政治意識，一方面則以議會請願運動為輔，以期達到台灣地方自治的目標。⁵這說明了文協發行的《台灣青年》（1920-1922）與《台灣》（1922-1924），其中發表的文字大多集中在議會政治與地方自治的議題之上。

不過，這並不意味民族意識次第被喚醒之際，階級意識全然蟄伏不動。連溫卿在一九二七年發表的〈過去台灣之社會運動〉指出，台灣社會運動之發軔較諸日本還要遲晚，這是因為殖民地經濟較為落後所致。他又指出，台灣社會運動理論的介紹，肇始於留學生的推介，而終於使島內的無產青年展開實踐的行動。因此，他說：「前者（留學生）的運動都偏於模仿，而後者（島內青年）

⁴ 葉榮鐘，《台灣民族運動史》，台北：自立晚報，1971年，頁9。葉榮鐘指出林獻堂與梁啟超的見面是在1909年：「林獻堂受梁啟超啟發最深，影響最大的一點，是關於台灣民族運動的方法問題，也就是任公啟發他效法愛爾蘭人之抗英，厚結日本中央顯要以牽制總督府對台人的苛政。」

⁵ 有關議會運動的形成及其影響，參見周婉窈，《日據時代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台北：自立晚報，1989年。

的主張，卻是以應照台灣社會的實情，想要離脫這種模仿的缺陷。」⁶連溫卿的觀察值得注意，左翼思潮的理論確實是由留學生的翻譯與鼓吹而傳播到台灣，但是，這樣的理論並不必然為台灣社會全盤接受，而應該是在實踐過程中，使理論與現實得到恰當的結合。確切而言，左派運動的萌芽，顯然有台灣社會主體的要求。

台灣留學生在日本與中國兩地，自一九二三年以後便開始呈現活潑的狀態。這是因為日本國內進入史上所謂的「大正民主」時期，馬克思主義思想在知識分子之間的傳播並未遭到警察的查禁。思想空氣開放之下，在這個時期到達東京的台灣留學生也逐漸燃燒起社會主義研究熱。日本警察檔案指出，「從來以主張民族自決主義來維持統一的台灣青年會內部，漸漸出現了傾向共產主義派的學生之對立。」⁷在東京活躍的左派學生中，最值得重視的，是活動力極為旺盛的許乃昌。他在東京完成「社會問題研究會」的組織，旋即於一九二三年抵達上海，進入上海大學社會科進修，獲得陳獨秀的賞識，被推荐前往莫斯科孫逸仙大學就讀，停留期間從一九二四年八月到一九二五年六月。返回上海後，又於同年八月前往東京，參與左翼運動。

赴莫斯科讀書之前，許乃昌在上海參加一個左翼團體「平社」。在這段期間，他對台灣的議會路線就已表達高度不滿。在平社的機關誌《平平旬刊》上，他以「沫雲」的筆名對議會請願運動抱持反對態度。在這篇文章中，他分析資本主義入侵台灣社會後所造成的影響。許乃昌認為，議會運動的抬頭，主要是因為台灣資產階級與壟斷台灣經濟利益的日本資產階級發生利害衝突。台灣資本家為了改善自己的生存環境，遂有台灣議會設置的參政運動。他的文中堅決指出，日本統治者絕對不可能施惠於台灣人，「台灣議會」的美夢斷難實現。許乃昌主張：「倒不如對內尋求團結，對聯合勞農階級國家及日本的被壓迫階級，乃至受日本掠奪的支那、朝鮮等國的人民，組成國際性戰鬥團體——反帝國主義大同盟，全力從事革命鬥爭。」⁸許乃昌對台灣右翼路線的公開批判，應該是始於這份文獻。從他的思考方式來看，他在赴莫斯科前，就已經具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策略的視野。

⁶ 連溫卿，〈過去台灣之社會運動〉，《台灣民報》（東方文化書局複刻本），第138號，昭和二年（1927）一月二日，頁12。

⁷ 〈東京台灣青年會社會科學研究部の結成〉，《警察沿革誌》，頁37。

⁸ 沫雲（許乃昌），〈台灣議會より革命運動まで〉，《平平旬刊》，創刊號，轉引自《警察沿革誌》，頁78-79。

相形之下，做為經濟學家的陳逢源，就傾向於自由主義的思想的擁護，從而對於合法的改良主義也以具體的文字與行動表達高度支持。在議會設置運動的成員裡，陳逢源不僅是追求政治上的地方自治，而且也是主張經濟上財政自治的少數倡言者。他在一九二五年正式提出「財政自治論」，特別指出自明治三十七年（1904）以來，台灣已經不再依賴殖民母國的援助。相反的，對日本的國庫貢獻至鉅。因此，他主張帝國議會應該考慮到集權財政的流弊，而容許台灣納稅者參與編列年度預算的權利，使殖民地經濟能夠更為自由發展。他進一步建議，殖民地預算應轉讓於殖民地機關，帝國政府僅保留認可權與公布權。同時，在殖民地設置財政評議會，可以提出監督會計的意見。⁹

因此，陳逢源的右翼思考極為清楚，便是讓台灣社會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充分自由地發展經濟，並且也帶動自由思想。他在《台灣民報》還刻意翻譯英國思想家羅素的演講詞〈自由思想與公開宣傳〉（Free Thought and Official Propaganda），藉以宣揚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對社會發展的重要性。在譯文之前，陳逢源附有短言，認為這篇文字「著眼何等確切，立論何等深刻」。¹⁰

許乃昌與陳逢源在發生論戰之前，兩人的立論基礎顯然已都齊備。站在左翼立場的許乃昌，認為議會設置運動企圖在日本的範圍內追求立法的權利無非是緣木求魚。以台灣的殖民地身分，絕對不可能得到帝國議會的正面回應。陳逢源的看法是，台灣財政對帝國的經濟發展有很大的貢獻，而這種財政實力足以支撐台灣地方自治的實行。他的理想是，議會請願運動必須持續下去，以爭取台灣議會的設置。通過台灣議會的成立，地方自治遂得落實，在政治上與經濟上都有深遠的意義。相較兩人的運動策略，許乃昌走的是國際共產運動的路線，主張聯合各國被壓迫的人民對抗殖民統治。陳逢源則是在日本帝國的範圍內，尋求帝國議會成員的支持。前者是強調國際主義與階級意識；後者則訴諸於自由主義與民族意識。

然而，造成陳逢源與許乃昌論戰的原因，還有直接與間接的因素。就間接因素來說，必須回到本文前言所說，台灣總督府認為國共分裂對文化協會的分裂有所影響，但欠缺具體的分析。文化協會的領導者之一謝春木，在一九三一

⁹ 陳芳園（逢源），〈台灣的財政自治論〉，《台灣民報》，第86號，大正十五年（1926）一月一日，頁3-5。

¹⁰ 羅素著，芳園譯，〈自由思想與公開宣傳〉，《台灣民報》，第104號，大正十五年（1926）五月九日，頁10。

年回顧文協分裂的原因，認為有中國的因素，也有來自日本的影響。

就中國因素來說，謝春木指出，一九二四年一月國民黨在廣東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決定聯俄容共的政策，致使孫中山失去舊同志，黨內遂出現西山會議派，造成左右兩派的傾軋。謝春木認為共產黨之樂於加入國民黨，是因為可以轉暗為明，公開宣傳社會主義的理念，利用國民黨的全國組織擴大自己的力量。因此，聯俄容共政策實行後，國民黨本身反而造成分裂，共產黨從而在工人勞動運動中取得主導地位。這個事實，使留學中國的左派台灣學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

就日本因素而言，一九二五年日本勞動總同盟分裂，而另外成立日本勞動組合評議會，左派的無產政黨也參與了日本的選舉，終於造成左右對立之勢。在這段時期，福本主義的菁英理論特別盛行，使左翼台灣留學生對激進主張產生認同。他們回到台灣後，已無法滿足文化協會既有的意識型態。¹¹

但是，更為重要的是，左翼思潮的崛起也是相應於當時台灣島上農民運動的不斷開展，階級意識也跟著高漲飛揚。一九二五年發生的二林蔗農事件，從發生到公審，前後拖延將近一年。這個事件大大刺激了左翼運動的勢力，也加速培植了更為濃厚的階級意識。¹²台灣社會的階級意識是一點一滴逐漸累積的。一九二五年《台灣民報》在出刊五週年的專輯時，蔡孝乾就撰文表示，台灣從大正九年（1920）以後，由於經濟蕭條，已迫使資本家、小資產階級、農林百姓一齊同歸於無產階級化。他當時就已預言：「我想此去五年，諒必發生無產階級的解放運動。」他更進一步吶喊：「看啊！台灣民眾將有『階級意識』而至『階級鬥爭』的開始。」¹³蔡孝乾的觀察極為準確，就在同年年底，二林事件就發生了。參與這場事件展開鬥爭的領導者，正是知識分子的醫生李應章。在公審時，他被判五年有期徒刑。

從國際的角度來看，左翼勢力在中國與日本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帶給台灣留學生無比的衝擊。就台灣內部的政治演變來看，階級意識與階級鬥爭也節

¹¹ 謝春木，《臺灣人的要求》，台北：台灣新民報，1931年（東京龍溪書舍複刻本，1972年），第二章，〈文化協會的改組〉，頁50-53。

¹² 有關二林蔗農事件始末，參閱「二林事件公判號」，《台灣民報》，第122號，大正十五年（1926）九月十二日，頁2-16。

¹³ 蔡孝乾，〈五年來的台灣〉，《台灣民報》，第67號，大正十四年（1925）八月二十六日，頁13-15。

節昇高。這些客觀的形勢都在要求台灣文化協會必須調整其既有的思想啓蒙的角色，而更積極回應甚至是日本警察業也窮於應付的階級運動。從這個歷史角度來看，文協似乎已經到達一個十字路口，向左轉或向右轉？文協的領導者敢不敢站出來介入農民運動與工人運動之中，就成為殖民地社會的重大課題。把陳逢源與許乃昌的論戰放在這個政治脈絡來考察，其歷史意義才能彰顯出來。

「中國改造論」論戰的再閱讀

陳逢源原先計畫在《台灣民報》發表系列的〈最近之感想〉，卻因為與許乃昌發生筆戰而未再撰寫。陳逢源的第一篇，是對後藤新平對台政策的嚴厲批判，指出日本統治者對台灣人完全採取歧視貶抑的態度。¹⁴第二篇則是以〈我的中國改造論〉為題，討論中國必須發展資本主義的理由。第三篇是〈新港北港講演記〉。¹⁵

這三篇文字，係針對日本在台實施殖民體制之偏頗而提出的批判。其中第一篇題為〈後藤子的殖民政策〉，乃是他閱讀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的著作《日本殖民政策一斑》的感言。¹⁶此書旨在總結日本的最初殖民經驗，以做為日後帝國的參考。其中第二章則在強調日本帝國在滿州的特殊使命。因為後藤新平在任滿台灣民政長官後，即被調任中國東北的滿鐵株式會社，把在台灣殖民地的行政經驗轉嫁到滿州。在討論一九三一年以後的滿洲國政治經濟政策之張本時，後藤的這本書已有重要的暗示。

陳逢源的第一篇感想雖短，卻提出極為強烈的批判，認為後藤新平在台灣施政方針是「榨取政策」與「壓迫政策」。陳逢源也抨擊後藤的教育政策，乃是「以無方針為方針」，所謂無方針，其實就是愚民政策。第三篇的感想題為〈新港北港講演記〉，是在報導文化協會的成員到雲林鄉鎮演講的情況。在啓蒙運動的工作上，文協誠然扮演非常積極的角色。陳逢源的報導指出，他在北港演講

¹⁴ 芳園，〈最近之感想（一）：後藤子的殖民政策〉，《台灣民報》，第119號，大正十五年（1926）八月二十二日，頁11-12。

¹⁵ 芳園，〈最近之感想（二）：我的中國改造論〉，《台灣民報》，第120號，大正十五年（1926）八月二十九日，頁8-10。芳園，〈最近之感想（三）：新港北港講演記〉，《台灣民報》，第125號，大正十五年（1926）十月三日，頁13-14。

¹⁶ 後藤新平，《日本殖民政策一斑》，東京：拓殖新報社，1921。根據序言，這本書係後藤新平在大正三年（1914）於東京的幸俱樂部所做的同書名的系列演講。

時，遭到日警的勒令中止。他的演講題目為〈愛國的真義〉，在於申論「自主主義」勝過「善政主義」。對於如此溫和的政治議題，日警認為這樣的內容已經無法接受。這篇報導顯示，文化協會內部的和平改革路線，即使採取低調的態度，也無法受到台灣總督府的寬容對待。陳逢源真正要表達的是，台灣在當時的大環境之下，如果議會路線與民族運動路線都不能被接受的話，則階級路線或左翼運動路線更是不容易實踐。這篇短文，無異是在支持他的第二篇文字〈我的中國改造論〉所表達的立場。

〈我的中國改造論〉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檢討中國為什麼要走資本主義的道路。全文分成五段落，主旨在於強調資本主義比起封建時代帶給人民自由與幸福。然而，引起論戰的爭議點有二：第一，他引述馬克思主義時，將之稱為「社會進化論」。第二，他在討論中國問題時，認為發展資本主義才是僅有的出路。中國資本主義之所以不能發展，主要是受到帝國主義的侵略，同時也不能收回治外法權而造成國家不能統一。他認為，要克服這種經濟上的障礙，就有必要更加發展商工階級的勢力。也就是說，中國只要發展更具實力的資本主義，就有力量對抗外來的帝國主義。就當時的論述水準而言，這篇文章誠然代表了民族運動路線的典型立場。全文共分六節，包括「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中國的社會組織」、「帝國主義的侵略的影響」、「商工階級的勃興」、「獎勵股份公司的必要」、「結論」。其中立論的關鍵點，便是引述一位中國國民黨員的談話；究竟中國的出路是走日本資本主義路線，還是俄國社會主義路線。這位國民黨員選擇的是俄國的道路。但是，陳逢源的看法卻相反。他認為，中國社會受到帝國主義的侵略已到根深蒂固的地步，如果中國選擇俄國路線，必將遭到列強的更深敵視。

陳逢源強調，中國要與帝國主義抗衡，就必須發展更為強勢的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資本主義深化後，民間才能累積財力，才有實力打倒軍國，後而進一步瓦解軍國背後的帝國主義。因此，他主張中國應該鼓勵民間成立股份有限公司，學習如何管理大組織。倘然這種大組織的管理無法完成，則追求社會主義也是奢談。陳逢源的見解，顯然是把股份公司等同於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議會政治訓練與民眾政治的養成。這樣的立場，與文化協會內部的議會路線是相互呼應的。

這些論點，立即引來許乃昌的強烈反駁。《台灣民報》分成四期連載他撰寫

的〈駁陳逢源氏的中國改造論〉¹⁷，這可能是許乃昌在報上發表的僅有文獻。他首先駁斥陳逢源對馬克思主義的一知半解，因為馬克思的理論是主張社會革命論，而非社會改造論。然後他集中火力抨擊陳逢源的中國資本主義發展論。首先，他強調中國軍閥的割據不能簡單稱為封建勢力，因為這些軍閥無非是依賴外來帝國主義的支撐而得以存在。也就是說，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結合之後才發展了中國的資本主義。因此，中國若要尋找出路，首先必須打倒軍閥，從根本去反對帝國主義。

許乃昌站在社會革命的立場指出，只要外國資本主義在中國一天，中國就沒有有一天發展資本主義的可能。他提出了一個極為核心的問題：中國有發展資本主義的可能嗎？他認為是有的，但首先的前提就必須發動國民革命。在這點上，許乃昌提供非常精闢的觀點，國民革命不能依賴資產階級。面對國民革命運動時，資產階級往往為了保護自身利益，如果不是妥協便是反動。真正能夠使國民革命完成歷史任務的，唯無產階級而已。這裡似乎已經暗示，中國國民革命是在國共合作的策略下展開，但是革命陣營內部暗藏著反動勢力。許乃昌撰寫這篇文章時，北伐軍的行動已臻於最後階段。從來沒有人預料，在北伐軍成功後，蔣介石立即攘奪革命的果實，背叛國共合作的承諾，遂殘酷進行清共運動，展開大規模屠殺，使國民革命全然變質了。

這篇駁論的可貴，並非只是針對陳逢源而已，還更進一步分析中國國民革命的本質。果真像文中所說，資產階級如蔣介石者，在面對國民革命時，就只會妥協或反動。因此，這篇文章確實穩健地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指出國民革命必須由無產階級來領導才能完成。循著這樣的理路，許乃昌進一步強調中國在現階段不能充分發展資本主義，而是要依賴國民革命去尋找出路。他又指出，中國社會是一個「中間型態」的社會；所謂中間型態，是指過渡時期。因為，中國封建制度已被外來的資本主義所破壞，卻又不能發展出自主的資本主義。這種畸形的特殊階段，更有賴國民革命來反對帝國主義。這樣的革命，不僅要聯合國內的各個階級，而且還要聯合全世界無產階級及其他被壓迫民族，才能使國際上的帝國主義削弱，從而使中國社會獲得解放。如果依照陳逢源的說法，朝著資本主義的道路去發展，中國則繼續落入帝國主義的操控，亦無出路一天。

¹⁷ 許乃昌，〈駁陳逢源氏的中國改造論〉，《台灣民報》，第126、127、128、129號，大正十五年（1926）十月十日、十月十七日、十月二十四日、十月三十一日。

陳逢源對於許乃昌的駁論全然不能接受，撰成〈答許乃昌的駁中國改造論〉，分成八期連載於《台灣民報》。¹⁸他先就自己的立足點作澄清。他承認社會進化有一定的次序，現階段中國社會確實是封建主義的崩壞期，資本主義的萌芽期。也就是說，中國資本主義尚未成熟，所以就更需要經過資本主義的洗禮，才能到達社會主義的階段。他認為馬克思主義史觀，並不是要經過突變或革命，而是一種進化的過程。他也主張，中國的迫切任務是打倒國內軍閥，取消不平等條約，使資本主義有充分發展的條件。

在他的答論裡，陳逢源並沒有像許乃昌那麼悲觀。他舉出一些數據，證明中國的商工業正蒸蒸日上，已有威脅日本產業之勢。因此，他認為，中國與其他殖民地應加速興起工業，使帝國主義的擴張受到阻撓。他說，英國工業已經式微，這個帝國主義魁首的國家既已受威脅，中國應加速收回關稅自主權，就能促使資本主義的發展。在如此有利的條件下，中國若樹起共產主義的旗幟，必將再度引來帝國列強的聯手干涉。至於俄國革命的前例，他認為並沒有真正完成無產階級的專政。在蘇維埃政權裡，真正獨裁的是擁有三十萬名黨員的俄國共產黨。以中國的經濟條件與國情文化，也並不適合實行共產主義。他提出一個異於左派的觀點，中國的歷史發展是有階段的，必先求得民族的解放，才能更進一步求得階級的解放。僅就這一點來看，顯然陳逢源似乎比許乃昌還有歷史透視的能力。因為，二十世紀八〇年代的中國共產黨，已經回頭走資本主義的道路。他在答論指出，中國非經資本主義的洗禮不可，然後採取漸進的社會主義政策。結論中他再度強調，中國的迫切問題不是社會革命，而是對外恢復國權，對內統一國家。實行徹底的民主，才能使中國找到出路。

緊接陳逢源的答論，蔡孝乾也發表另一篇駁論抨擊回應。¹⁹蔡孝乾抓住的第一個重點是，陳逢源在觀察中國問題時，僅專注於中國本身的情況，卻未注意到國際的變化。舉凡中國境內所發生的問題，無不強烈帶有國際的意義。他列舉系列的史實，從鴉片戰爭到割讓台灣，從俄國佔領旅順、大連到辛亥革命，沒有一個事件不是密切聯繫到國際的帝國主義。他也承認，中國封建制度確實

¹⁸ 芳園，〈答許乃昌的駁中國改造論〉，《台灣民報》，第130、131、132、133、135、136、137、139號，大正十五年（1926）十一月七日、十一月十四日、十一月二十一日、十一月二十八日、十二月十二日、十二月十九日、昭和元年（1926）十二月二十六日、昭和二年（1927）一月九日。

¹⁹ 蔡孝乾，〈駁芳園君的「中國改造論」〉，《台灣民報》，第134號，大正十五年（1926）十二月五日，頁10-13。

已遭到外國資本主義的破壞，農業經濟與大家族制度也全然被衝破了。蔡孝乾答以兩個重要論點：第一、中國已經存在著國際資本主義。第二、所以中國已不可能向資本主義的道路發展。任何與資本主義相關的行動，都在外國勢力掌握之中。他反問陳逢源，中國商工階級有真正的實力去打倒國際帝國主義的勢力嗎？五卅運動便是最具體的答案。蔡孝乾強調，中國的出路應該是改變既有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只有摧毀這種定型的關係，新的社會才會產生，也就是打破經濟上支配階級與被支配階級的關係。他說，在經濟上支配的階級，在政治上仍是支配的階級。所以經濟構造的改變，自然需要政治構造的改變。他特別陳述最重要的觀點，革命的原因不外是生產力與其榨取階級在政治權力擁護的生產關係之間的衝突對決。蔡孝乾已經點出他的主要意旨，社會革命要改變的不只是政治權力的掌握，而且也是經濟上生產關係的改變。

這場論戰的最後總結，是許乃昌的答辯〈給陳逢源氏的公開狀〉。²⁰在這篇文字裡，許乃昌似乎動了一些情緒，但整個思考理路仍然非常清晰。他公開對陳逢源聲明，「我們相信無產階級將來要出來創造新的歷史，我們一切的主張都要以無產階級的利益為前提。」以此劃清界線，表示與資產階級的立場迥然不同。這篇文字先釐清唯物史觀的問題，以及譯文上的夾纏問題，然後集中於中國資本主義的討論。他指出陳逢源所有提出的數據都是抄襲而來，並沒有從事真正的研究。顯然，他要強調的是，陳逢源的知識都來自紙面上的紀錄，而不是經過實地的研究調查。對於主張實踐（praxis）的左翼知識分子來說，沒有任何理論是可以脫離現實的。而且，沒有一種研究，都只是停留在表面現象，而不透視事物的本質。在這篇結辯的文字，許乃昌並沒有提出更新的詮釋。不過，從陳逢源對他使用調侃、嘲弄語氣的文字，以及許乃昌以憤怒而嚴肅的態度回敬來看，已經清楚預告台灣左翼與右翼運動從此就宣告分道揚鑣。因為，在雙方辯論的過程中，文協內部已展開前所未有的權力鬥爭。「中國改造論」論戰，正是這場政治分裂的一個主要症候。

論戰的歷史隱喻

台灣文化協會的分裂，主導者應推連溫卿。這是因為鑑於台灣農民與工人

²⁰ 許乃昌，〈給陳逢源氏的公開狀〉，《台灣民報》，第142、143號，昭和二年（1927）一月三十日、二月六日，頁11-12、頁11-14。

的階級意識已臻於成熟，文協應該有責任和義務擔任領導的角色。也就是說，文協不應繼續停留在思想啓蒙的階段，而應積極以實踐的行動介入當時的社會運動中。²¹更重要的是，連溫卿認為殖民地運動的模式，無需完全仿效殖民母國的運動策略。他主張凡屬台灣的社會運動，都是屬於政治運動。因此，他堅持認為農民運動與工人運動「可以組織統一之，不以地方利害打算，應以全島的目標方可。」²²他之所以積極爭取文協的領導權，便是希望透過這個全島性的組織去領導日益成熟的農工運動。

面對如此洶湧的左翼奪權策略，右翼運動的精神領袖林獻堂在其日記有如此的紀錄：「…恐惹人恥笑並生誤解而起內訌，則我文協之前途不可收拾矣，六年間辛苦奮鬥之歷史，具付諸東流，實為可惜。不如暫作冷靜，以觀其作為，若彼等具有相當之努力，吾人亦當亦以相當之應援。若彼等用文協以宣傳其共產主義，或是無力努力啓發文化，那時欲分裂欲改革，皆無不可也。」²³這是林獻堂宅心仁厚之處，但亦是他對左翼運動實況的不了解。在文協內部，對左翼運動者，也是盡量包容共存。最明顯的證據是：在論戰以後，文協的《台灣民報》開始大量刊登有關農民運動的報導，以及宣揚社會主義的文章。蔡孝乾發表的〈轉換期的文化運動〉一文，最能彰顯這次論戰的影響。他認為陳許之間的論戰，「是台灣思想界轉換期的特徵之一」。緊接著他就強調：「有了思想界的轉換，才促成了文化協會有意義的改組，才證明了台灣思想界的有意義的轉換。」²⁴

不過，這樣的左右共存，僅持續不到半年。《台灣民報》在發行到第一百六十六號以後，編輯部從東京遷回台北，並改為週刊發行。也就是說，《台灣民報》在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二日發行旬刊的最後一期後，正式成為文協分裂後的台灣民眾黨的機關刊物，因為林獻堂及其幹部林幼春、蔣渭水、蔡培火、陳逢源，終於還是無法接受組織內部的階級意識過於膨脹。他們決意脫離文協，另組政黨，同時也把機關誌《台灣民報》一併帶走。左傾後的新文協，反而失去了發言的機構，遂不得不自創刊物，亦即《台灣大眾時報》。一份純屬左翼言論的月

²¹ 參閱陳芳明，〈連溫卿與抗日左翼的分裂——台灣反殖民的一個考察〉，《殖民地摩登》，台北：麥田，2004年，頁265-292。

²² 連溫卿，〈過去台灣之社會運動〉，頁12。

²³ 林獻堂著，許雪姬編，《灌園日記（一）一九二七年》，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0年；昭和二年（1927）一月三日條，頁16。

²⁴ 蔡孝乾，〈轉換期的文化運動〉，《台灣民報》，第143號，昭和二年（1927）二月六日，頁11。

刊，於焉誕生。²⁵

連溫卿在《台灣大眾時報》，特別撰文為「中國改造論」論戰的意義做了更為明晰的詮釋：

台灣社會的發展是以一九二七年一月，台灣文化協會改組後，極其多忙成長起來，遂見有二個潮流的對峙。先是未改組以前，即有由中國改造問題，而引起對資本主義的論爭。亘三個月間，而雙方的主張台灣有資本主義也是沒有？很引起一般社會的留意。一是主張，台灣雖沒有所謂資本家，那自然就沒有資本主義的存在，所以台灣要豫先使台灣人的資本家發達起來。能夠到達和日本資本家對抗的地位，才是合理的。欲著到這個目的，須要以民族運動去進行的。他（另外）的主張，和這個主張，卻是相反。台灣雖有資本家也沒有發展到能夠獨立的地位。因為在台灣的資本主義，已經鞏固了地盤的緣故，而被壓迫、榨取的台灣人，不是祇限於少數資本家及地主而已。此外，還有最大多數的勞動者與農民存在。所以欲解放台灣人，應該要主張階級鬥爭。²⁶

連溫卿的說法，使「中國改造論」論戰的意義彰顯出來。原來陳逢源的「中國改造」，其實是暗示著「台灣改造」。也就是說，他在討論中國要不要走資本主義的道路，原來就是在為台灣民族主義派的議會路線進行辯護。同樣的，許乃昌的駁論，也是在為台灣左翼運動宣揚政治理念。他在文字中指出中國資本主義完全為外來帝國主義者所壟斷，無非就是在揭示台灣資本主義其實都掌握在日本殖民者手上。具體而言，只要把兩人所提的「中國」符號全部轉換成「台灣」，整個謎底便昭然若揭。

因此，「中國改造論」論戰的重心完全是放在殖民地運動的主體性之上。只有通過這種隱喻與影射的方式，他們才能在文中暢談「解放」、「推翻」、「革命」、「改造」的議題。歷史條件並未容許殖民地運動的左右兩派有充足發展的空間。如果左傾新文協與台灣民眾黨沒有被解散，他們的辯論內容是否就能得到恰當的檢驗，現在已無法提供準確的答案。

²⁵ 有關《台灣大眾時報》發行經緯，參閱陳芳明，〈《台灣大眾時報》與《新台灣大眾時報》〉，《殖民地台灣》，台北：麥田，1998年，頁193-214。

²⁶ 連溫卿，〈台灣社會運動概觀〉，《台灣大眾時報》（台北南天書局複刻本），創刊號，東京：大眾時報社，1928年，頁15。

台灣社會改造論的提出

陳逢源、許乃昌、蔡孝乾之間有關中國社會改造的論戰，無疑是當時台灣政治運動陣營內部的路線之爭。對於社會性質的理解，往往決定政治運動者所要採取的路線。自一九二五年以後，農民運動的勃興，已相當篤定地把階級路線的思考帶進台灣文化協會的組織內部。²⁷這種階級路線的形成，自然與日本資本主義的鞏固與提昇有著密切的關係。在農民運動不斷崛起的形勢下，文化協會自然被要求必須在議會改良主張之外，對於階級路線的要求應有所回應。原來遵循全民路線或民族路線的文協，已經到達必須考慮如何接納階級議題的階段。

在殖民地社會裡，民族運動路線的議會制度與社會主義路線的群眾運動之間，究竟是完全相反的道路還是相對的道路，正是一九二六年與一九二七年之交台灣知識分子最感迫切而苦惱的政治問題。「中國改造論」的論戰，並沒有獲得具體的結論，反而使左右兩條路線的思想衝突更形劇烈。這種思想的左右對決，具體表現在一九二七年台灣文化協會的分裂。²⁸對於右派的支持者來說，追求議會制度的全民路線是符合台灣社會的現實條件。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的《台灣民報》，發佈〈文協真分裂〉的一篇短文，正式宣告左右兩派已無法相容。²⁹正是在這期的社論，右派路線提出這樣的論題〈以農民階級為基礎的民族運動〉。在字裡行間，舊有的文協成員仍然還在努力如何在既有的組織結構納入左翼路線的思考。這篇社論說得非常清楚：「帝國主義國內被壓迫階級的解放運動，應取階級運動，在帝國主義國內殖民地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以農工為基礎的——這是世界解放運動的原則。現在的中國，就是採取以農工階級為基礎的民族運動。台灣近來有人主張採取階級鬥爭，這是很錯誤的。」³⁰

社論主旨在於提出，在資本主義國家內部並沒有民族壓迫，而只有階級壓迫。因此，像日本帝國主義這樣的殖民地母國，受壓迫的農工階級自然會採取

²⁷ 有關農民運動的階級路線，參閱陳芳明，〈簡吉：日治下左翼運動的實踐者〉，台北市政府主編，《漫漫牛車路——簡吉與台灣農民組合運動》，台北：台北市政府，2004，頁80-81。另見拙著，〈簡吉與日據時期台灣左翼運動的擴張〉，將宣讀於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主辦，「地方菁英與農民運動學術討論會」，2005年7月13日、14日。

²⁸ 關於文協分裂的研究，參閱林柏維，《台灣文化協會滄桑》，台北：台原出版社，1993。尤其是第六章〈文化協會之分裂〉，頁213-260。

²⁹ 〈文協真分裂〉，《台灣民報》，第155號，昭和六年（1927）五月一日，頁13。

³⁰ 〈（社說）以農工階級為基礎的民族運動〉，《台灣民報》，同上，頁1。

純粹的階級鬥爭路線。但是，在殖民地社會如台灣者，在階級壓迫之外，還有更為全面的民族壓迫。面對雙重的壓迫，殖民地知識分子肩負的運動，既要照顧民族議題，也要兼顧階級議題。這篇社論的重點，正是強調以農工階級為基礎的民族解放路線。但是，左翼路線的支持者，看法固然接近，運動的重心則以階級解放為最高目標。在分析台灣社會的性質時，連溫卿當時就已指出，被壓迫的台灣人，絕大多數是屬於農民階級與勞動階級。要使台灣社會獲得解放，就不能不採取階級運動路線；因為，只要站穩階級立場，民族立場也就跟著彰顯。³¹連溫卿的這種見解，也與當時日本學者矢內原忠雄的看法類似。矢內原忠雄在他的專著中有這樣的觀察：「台灣階級運動，必然具有應帶民族運動性的社會的理由。」他又指出：「台灣的階級運動，一方面是以其殖民的事實為基礎，同時又帶有民族運動的性格。而在另一方面，也是台灣的民族運動帶有階級運動的性格。」³²看法雖是如此接近，連溫卿仍然還是強調以農工群眾為主導的階級路線才是解放之道。這是因為農工的群眾力量較諸走民族路線的資產階級還更具革命性。

左右兩派知識份子的立場是如此歧異，以致文協的舊幹部不得離開他們所創立的組織而另起爐灶。客觀形勢迫使原來對階級路線還能包容的資產階級運動者，必須完全放棄左翼思考，而朝著楊肇嘉所說的「向單一目標前進。」³³所謂單一目標，便是純粹走合乎日本殖民體制要求的合法改良主義之議會路線。一九二七年之後，文化協會落入連溫卿的左翼運動者掌握之中，而右翼運動者則另外組成台灣民眾黨。

然而，分裂事實鑄成後，有關社會改造論的議題，仍然是政治運動中的主要關切。一九二七年九月台灣民眾黨成立前夕，《台灣民報》發表一篇短評〈社會改造與台灣〉。就其內容而言，非常明顯是「中國改造論」論戰的申論。文中指出，社會運動者的社會改造主張，必須照顧到大環境，應該根據「現時代」與「當社會」的條件立論，亦即在時間與空間上有立足點才能獲得實踐。這篇短文強調，台灣社會的癥結，乃在於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界線判然分明，台灣人在政治上絲毫沒有權利。在經濟上，利益完全為日本移居來台的資本家、政商、御用黨所壟斷。政治利益與經濟利益的密切結合，使台灣人完全被排除

³¹ 連溫卿，〈台灣於日本殖民政策實態〉，《史苑》，第35卷第2號（1975），頁61-83。

此連溫卿遺稿，係由故戴國輝教授發現並整理，而發表於日本的學報。

³² 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台北：帕米爾，1987，頁182-183。

³³ 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第二冊，台北：三民，1970，頁235-255。

於政府的範圍之外。³⁴雖是篇幅甚短，這篇文章似乎在暗示，當時左翼運動者只談階級鬥爭，卻對客觀現實未有深刻理解。此文顯然在提醒左翼人士認清，台灣社會並沒有真正的台灣資本家，鬥爭的方向並非在政治運動陣營的內部。

在台灣民眾黨中央委員會召開的前後，重要黨員幹部分別於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三日與十八日在台南舉行兩次「台灣社會改造觀」的演講會。受邀參加的成員包括韓石泉、王受祿、陳逢源、盧丙丁、彭華英、謝春木、蔣渭水。從發言的內容，可以理解當時左翼運動的氣焰日益熾烈，參與的發言者顯然是對階級鬥爭的提法頗覺不妥，韓石泉與王受祿都表達同樣的態度。韓石泉認為，台灣人中間並不存在所謂的大資本家，真正的政治經濟實權都掌握在日本人手上。當台灣人的文盲仍然普遍存在之際，知識程度還是非常低落。因此，政治運動的重心應放在啓蒙與團結之上。王受祿的論點也是認為不宜主張階級鬥爭，應該促使台灣人團結起來，向日本人要求政治平等。對於貧民問題，則應循社會改良主義的管道來救濟。³⁵

陳逢源的演講，最值得注意的是重申他在〈我的中國改造論〉的觀點。第一、他強調台灣社會從來沒有經歷過西歐式的產業革命，資本主義根本不可能有發達的機會。第二、台灣人口百分之五十以上是農民，並沒有近代產業中的大規模勞動者，因此，台灣人既然欠缺足夠的勞動者，當然沒有所謂的左派。³⁶這種說法，等於又在回應在此之前參加論戰的許乃昌。他似乎是在暗示，台灣左派罔顧現實，在資本主義並不發達的社會反對資本主義，在勞動階級並不成熟的社會主張階級路線。與他一起發言的盧丙丁、彭華英、謝春木也都持近似的論點，都一致認為台灣社會不適合共產主義，或是台灣社會的階級運動不宜推行。他們強調，台灣人要得到經濟解放之前，首先應致力於追求政治解放。³⁷

在這次演講系列中，唯蔣渭水使用「民族問題與階級問題」為題目。然而，他並沒有申論自己的觀點，而只是介紹當時左翼思潮中經典人物的民族觀，包括馬克思、恩格斯、高資基（考茨基）、列寧、大山郁夫、布施辰治、孫文、汪

³⁴ 〈社會改造與台灣〉，《台灣民報》，第174號，昭和二年（1927）九月八日，頁2。

³⁵ 〈台灣社會問題改造觀（一）〉，《台灣民報》，第176號，昭和二年（1927）十月二日，頁7。

³⁶ 〈台灣社會問題改造觀（二）〉，《台灣民報》，第177號，昭和二年（1927）十月九日，頁8。

³⁷ 同上。

精衛、孫科。³⁸在介紹過程中，蔣渭水認為民族路線與階級路線應是並行不悖。從所有講演者的立場來看，他們思考的重點都集中在政治問題，尤其是偏重改良主義的議會路線，反而對於台灣社會結構與經濟結構較少深刻的討論。陳逢源所提的見解，縱然仍是延續「中國改造論」論戰的立場，卻是所有演講者中較具分析能力的一位。這可能與他的財經訓練背景有密切關係。³⁹

不過，這次的「台灣社會問題改造觀」演講，卻意外引發另一次小小的論戰。民眾黨員蔡培火，在演講結束後單獨發表一篇長文〈台灣社會問題改造管見〉，分成四期連載於《台灣民報》。⁴⁰由於這篇文章的立論基礎過於唯心，而遭到左翼運動者黃石輝的批駁。⁴¹這是「中國改造論」過渡到「台灣改造論」的一次理論演出。也是右翼運動者與左翼運動者之間的一次思想再決裂。

蔡培火的文字，並不依據台灣社會現實去分析，而只是停留在想像的演練。在緒論中，他的重點是「內地人（日本人）若是靠著他們的政治和社會的優越地位，無視本島人的利益，本島人就該考慮相當的對策去抵制他。」蔡培火提出的對策是，男人、資本家、業主、女人、工人、佃人都應該組織起來，各自有團體之後，「社會改造成更加美滿的狀態。」依照這樣的思考，他的全文分成三大段落：「人人須團結」、「個個要讀書」、「行人道切勿爭鬥」。翻來覆去所要申論的，只不過是依個人利害關係去組織團體，並且要多讀書來避免成為傀儡。最後，以人道主義做為行動的最高指導原理，投入民族運動。這篇連載四期的文字，顯現了蔡培火在思想上的迂闊與空泛。置諸前述的演講系列中，無論如何是不具絲毫說服力的。

黃石輝的批判文字，則表達清楚的分析能力。全文的第一部份，對蔡培火

³⁸ 〈台灣社會問題改造觀（三）（四）（五）〉，《台灣民報》，第178、179、180號，昭和二年（1927）十月十六日、二十三日、三十日。

³⁹ 有關陳逢源參與「中國改造論」論戰的始末，以及他在經濟學方面的專書，參閱謝國興，《亦儒亦商亦風流：陳逢源（1893-1982）》，台北：允晨文化，2002。尤其是第八章，〈左右論辯〉，頁160-189，與第九章，〈財經理論與實務〉，頁190-232。

⁴⁰ 蔡培火，〈台灣社會問題改造管見（一）（二）（三）（四）〉，《台灣民報》，第181、182、183、184號，昭和二年（1927）十一月六日，頁8；十一月十三日，頁8；十一月二十日，頁8；十一月二十七日，頁8。這篇文章並未收入張漢松主編，《蔡培火全集》（共七冊），台北：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00。

⁴¹ 黃石輝，〈「改造」之改造（一）（二）〉，《台灣大眾時報》（周刊），第九號，昭和三年（1928）七月二日，頁13-14；第十號，昭和三年（1928）七月九日，頁11-13。此文並未續完，因為這份周刊係屬分裂後的新文協機關誌，遭到台灣總督府的沒收並勒令停刊。

極盡調侃嘲弄之能事。但在第二部份，卻在民族問題與階級問題上做了簡明扼要的闡述，共分成三點：第一、階級鬥爭是全體的，民族運動是部分的；第二、階級鬥爭不是民族運動，民族運動卻是階級鬥爭的一部份；第三、主張階級鬥爭的不會反對民族運動，主張民族運動的會反對階級鬥爭。循著這樣的思考方式，黃石輝進一步分析階級的形成、殖民地的由來與階級鬥爭、過去民族運動的結果，以及團結的意義。他特別指出，在殖民地社會，大多數被殖民者都淪為農工階級。如果只講求民族解放，則政治鬆綁時，階級並未獲得解放。他以中國的辛亥革命為例，縱使推翻滿清，仍然還是使大地主繼續壓迫農民，使大資本家繼續剝削工人。歷史事實證明，民族解放的結果，既得利益者還是依舊壟斷利益。民族運動者往往利用農工階級的力量推翻外來統治者，然而民族解放的結果，卻使少數人得到利益，農工大眾只是被當做利用的工具。他又舉出實例，在殖民地社會，如台灣的辜某，早已獲得利益，民族或階級對他們毫無意義可言。在殖民地已經享有利益者，自然是反對革命，因為革命的結果極有可能改變他們的既得利益。他認為蔡培火主張資本家要組織起來，完全是對台灣社會的無知。黃石輝以事實指出，被解雇的台灣工人就是遭到資本家有組織的迫害。所有的解雇者都已列成名單，在每個工廠都無法被錄用。

黃石輝的全文並沒有連載完畢，因此無法得知他完整的觀點。不過，從其上乘的分析方式，就可知道他非常熟悉台灣社會的經濟性質。黃石輝的左翼立場，在政治運動中應屬鮮明銳利。不過，他真正展現批判的能力，是在稍後的台灣新文學運動中引發的台灣話文論戰。他在一九三〇年發表〈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與〈再談鄉土文學〉，高舉左翼思想的旗幟，造成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四年的文學論戰風潮。⁴²

結語

「中國改造論」論戰與「台灣社會改造」的討論，代表一九二〇年代台灣政治運動到達一個分合的關口。借用中國的鏡子來鑑照台灣，完成了一次思想上的偷渡，恰好可以反映出台灣知識分子在殖民地的有限條件裡所做的極限挑戰。這場論戰並未得到具體的答案，因為歷史沒有提供餘裕空間讓左右兩派運

⁴² 黃石輝在三〇年代話文論戰中的發言位置，參閱中島利郎編，《1930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2003。

動者得到充分的發展。史實已經顯示，左翼路線在一九三一年就遭到中止，右翼路線則延續到一九三六年因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的解散而停頓下來。階級運動者憧憬的台灣革命，終於沒有發生；民族運動者期盼的台灣議會，最後也未實現。然而，兩條路線的頡頏抗衡，彷彿是相互掣肘，卻又好像是相互競爭。雙方遺留下來的思想文件，已成為台灣社會的重要文化寶藏。他們以論戰的方式，傳播各自的理念。尤其是對階級路線的左翼運動者來說，論戰帶來的思辯，使他們的理論層次提昇，也使他們的組織透過思想結盟而得以擴張。分析他們的政治主張，反而更能看清楚殖民地體制的統治本質，也彰顯出台灣知識分子在困境中所形塑的策略。在歷史的另一個盡頭，他們放射出來的智慧，仍然對後人啓開不盡的想像。